

唐宋八大家全集
韩愈集

主编

余冠英 周振甫
启功 傅璇琮

唐宋八大家全集

余冠英 周振甫 主编
启 功 傅璇琮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韩愈集

王宏治

陈炬红 整理

崔高维

《唐宋八大家全集》编委会

主 编 余冠英 周振甫 启 功 傅璇琮
副主编 仇正伟 李肇翔 金 锋 孙以年
特邀编审 冯惠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仇正伟	王宏治	叶爱民	冯惠民
孙以年	朱振华	启 功	余冠英
余 喆	张文强	李 克	李 岩
李肇翔	周振甫	金 锋	杨梦东
赵又新	赵 东	胡宝国	贺照田
钱 华	柴剑虹	曹月堂	崔高维
舒 炜	谢俊峰	傅璇琮	

前言

傅璇琮

“唐宋八大家”一词，最初是明朝人提出来的，而明人提出“唐宋八大家”，则主要着眼于文章。实际上，八大家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不限于文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其诗歌创作，无论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在中国诗史上都有他人所不能代替的特色；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更是词的大家，在两宋词坛上，都能独树一帜。因此我们今天来评论和研究唐宋八大家，不能拘限于明人的见地和所定的范围，应当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出发，对这八位大作家的作品给以全面的历史的把握。

应当说，唐宋八大家是不能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看待的。韩愈和柳宗元，同处于中唐时期，在他们面前，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是相同的，他们共同倡导后来所谓的古文运动，但韩、柳二人无论散文或诗歌，风格是极不相同的，文学主张也有所差异。欧阳修自己说是继承韩愈的文学革新主张，但他的创作实践与韩愈也有所不同，而正因为他所倡导的条达疏畅、委婉闲易的风格，就开创了有宋一代诗文不同于唐代的崭然独立的面貌。王安石、曾巩、三苏，更其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唐代有大历诗风、元白体，宋代有江西、江湖诗派，但不能说在古代诗、文的流派中有一个“唐宋八大

家”。我们应当承认这八大家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各有其独特的文学成就，唯其如此，他们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形成“重镇”，他们的总体成就，是可与“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传统文化瑰宝相并比的。这也是我们把这八大家的文学作品尽可能搜辑齐全、编纂成全集的主要动因。

编纂唐宋八大家全集，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今天的读者能直接接触和阅读古代文学原作。我们今天无论是想欣赏古代佳作，还是想作一些研究，最重要的是应该多读作品，而且应尽可能了解作家作品的全貌。选集是需要的，但选本终究不能代替全集，读选本与读全集，人们的感受就是不一样。杜甫咏泰山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想，读过全集的人，当会有杜甫的这种感受。这应当也是一种读书乐趣与文化追求。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几位搞古籍整理的中青年学者，于1994年秋向文学史界老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先生提出编纂唐宋八大家全集的设想。令人感到惊喜的是，长期卧病在床的余先生十分赞赏这一设想，并且欣然同意担任全书的主编。这一项目也得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支持，他们极愿合作，并且纳入该社精品图书规划，尽快把这套大书编印出来。

余冠英先生的首肯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支持，自然是对这项工作的极大鼓励，但实际工作做起来，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着重提出“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要求，为实现这一任务，在具体实践中，就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我们体会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决议》所说的“重视出版传统文化精品和有价值的学术著

作”。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应该说是传统文化精品，我们应该谨严从事，掌握古籍整理的基本知识和手段，使这一全集同时成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工作应有一个通盘计划，首先是人力安排和整理方案。在人力方面，我们力求依靠专业力量，参加编辑、校勘、标点的，都应当是有过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并且视古籍整理为学术事业因而能专心来做的。这次参加的编纂、整理者，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图书馆、中华书局。我们认为，从这些单位来考虑参与者，整体的文化素质与工作能力是可以信任的。

整理方案则有好几个方面。首先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底本。这方面是颇费斟酌的。唐宋八大家固然是名家，但历史上关于他们的全集整理却极少，过去往往是诗、文、词分别刻印的。此次我们要求整理者一定要考查并理清版本源流，掌握已有成果，在此基础上确定底本与参校本。近十几年来文学古籍整理研究有较大进展，如《全宋诗》、《全宋文》以及《全唐诗补编》等具高水平的著作，都应及时利用，吸取有益成果。现在各集均有辑佚，能基本反映出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各集之后还附有作家传记资料、作品评论资料，这些都可省却读者跑图书馆的翻检之劳，对教学者和研究者都提供方便的条件。

这里应有两点需要交代：一是全书采用简体、横排，二是在校勘上采取有校改而不出校记的方式。后一点，具体说来就是：在用参校本校底本时，凡遇有文字不同的，采取校是非不校异同的原则，即文字两通的，不管文义如何，一律即据底本，不加改动；凡属底本中的衍文、错讹文字，均加圆括号（ ），并排六号字以示区别，凡据他本添加及改正的文字，则用方括号〔 〕表示。

按过去的古籍整理常规来说,全集的点校本是应当用繁体字的,而且以竖排为好,同时在校勘时,遇有校改即应出校勘记。我们认为,这一原则是对的,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资料性较强的古籍著作,一定要这样做。但古籍整理也应随客观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古籍为现实服务,更贴近现代生活与创作,这就要考虑尽可能用现代人所习惯的形式使文学古籍更好地走向大众。繁体、简体,只是一种印刻形式,繁体能较多地保持古籍原貌,当然应该肯定,但现在广大读者确已习惯于简体字,繁体字在没有注释的情况下会造成阅读上的一定困难,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在保证文字无误、校勘准确的情况下采取今天读者易于接受的简体、横排的方式呢?消除阅读上的障碍,当能加深理解和增强鉴赏的乐趣。

过去古籍整理图书,有校改而未有校记,也有先例,如五十年代出版的新标点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出版)即是如此。《通鉴》这样做,出版后也得到研究者与一般读者的认可。特别是考虑到这套《唐宋八大家全集》主要还是面向广大读者群,假如详出校勘记,则读者可能会感到不胜其烦。我们的目的是想帮助读者直接阅读原文,以便真正理解和欣赏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不必分心去扣读校记。只要保证确是经过细心的版本校勘,在择定正误上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那末这就可以作为一个阅读定本提供给今天的读者,这样做当是有利而无弊的。

最后还应说明的是,余冠英先生于1994年秋本是想为这套全集本写一总序的,但余先生过不多久不幸去世,后即由周振甫先生撰写全书的导论,对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成就作了全面的阐述。启功先生作为主编之一一直十分关心整理、出版情况,叮

嘱一定要细心谨慎,注意质量,并特地为全书题签书名。李肇翔、仇正伟、金锋同志在组织人力、审阅书稿中做了不少具体工作。特别是仇正伟同志,他在拟定整理方案、约集整理者的前期工程中多有通盘考虑,在后期的审稿加工中更是细心负责,字斟句酌。冯惠民同志在确定全书体例方面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并作为特约编审,认真审阅了部分书稿。这好几百万字的大书能在短短几年内整理出版,洵属不易,我们应提倡这种勤奋奉献的精神。当然,书中难免有不当、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六年十月

导 论

周 振 甫

唐宋八大家定名与背景

《四库全书总目》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称：“《明史·文苑传》：‘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右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按《文编》所选，自周迄宋，不限于唐宋。其所选唐宋文，虽限于八家，而无“唐宋八大家”之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实本于《文编》所选八家，而“唐宋八大家”之名，则为茅坤所定。《文编》所选唐宋八家，又当推本于明初朱右所选之《八先生文集》。《八先生文集》虽不传，但明贝琼有朱右《唐宋六家文衡序》，称“六家”，以“蜀苏氏父子”三家为一，实即八家。贝琼序称朱右之选：“降于六朝之浮华，不论也。昌黎韩子倡于唐，而河东柳氏次之。五季之败腐，不论也。庐陵欧阳子倡于宋，而南丰曾氏，临川王氏，及蜀苏氏父子次之。”是朱右所选，以唐代韩愈起来反对六朝浮华的文风，倡导古文运动，柳宗元和之，因选韩柳两家。以五代文风败腐，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曾、

王、三苏和之，因选宋代六家文。唐顺之选《文编》，自周迄宋，于唐宋两代取于朱右所选之八家，以上窥秦汉。《四库全书总目》于《文编》称：“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自正、嘉（正德、嘉靖）之后，北地、信阳（李梦阳、何景明）声价，奔走一世。太仓、历下（王世贞、李攀龙）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是唐顺之的《文编》以唐宋八家，上继秦汉，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摹仿秦汉文的字汇句法。朱右（？——1376）字伯贤，明初临海（在浙江）人。明朝征右编《元史》，史成归里。又征右编《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长史。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明武进士。官至右金都御史，巡抚淮扬，工古文，人称荆川先生，著有《荆川先生文集》。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明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官至大名兵备副使，著有《白华楼藏稿》等书。

朱右选唐宋八家，有见于唐代的韩柳两家，反对六代的浮华而发动古文运动来的；宋代的欧阳、曾、王、三苏六家，反对五代的腐恶，发动古文革新运动来的，是有所见的。唐顺之选唐宋八家，是有见于八家之文，有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可以上继秦汉，以救明代复古派之弊。茅坤选唐宋八家，所得较浅，欲从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以求八家之法，不免落入学唐宋文的窠臼。

再看唐代韩、柳两家，《新唐书·文艺传》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始则唐高祖、太宗“沿江左余风，编句绘章，故王、杨（王勃、杨炯）为之伯。”次则“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张说、苏颋）擅其宗”。三则“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遂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轶汉、周，唐

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这就是韩愈倡导，柳宗元和之的唐代古文运动。

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六朝到初唐，骈文盛极一时。骈文讲究形式，讲对偶、声律、辞藻，它的流弊忽视内容，构成一种形式主义文风。韩愈起来倡导古文运动，即用唐代文辞仿古代的散文写法，称为古文。反对骈文，用古文来代替骈文，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创作成功的古文作范例，一要提出创作古文的理论来使人信服。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这就是唐代的古文两大家。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骈文又兴盛起来，到宋初的杨亿，提倡西昆体，用骈文来作文，盛极一时，石介起来反对杨亿，又兴起一种怪异的文风。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轼、辙和之。他们的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的理论，也获得大成功，成为宋代的六大家。唐代两大家和宋代六大家合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导古文运动的成功，依靠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理论的成功。先看唐代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的成就。

韩柳在创作古文上的成就

《旧唐书·韩愈传》称他创作的古文为“经诂之指归，迁、雄之品格。”经诂指儒家的经书，即用儒家的理论来写古文，又推重他的古文，说有司马迁、扬雄的气势格调。韩愈的学生李汉，替韩愈的文集写序，称韩愈的文章：“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愍惻当世，遂大拯颓风。”“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赞美他的古文，宣扬

儒家的仁义道德，与日月争光，与宝玉比洁。他的古文，还写出了各种形态。在反对骈文上，具有摧陷廓清的功效。宋代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赞他的古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即指从东汉到隋的八代中骈文极盛，思想上异端并起，包括佛、道思想盛行。称“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指韩愈提倡古文，倡导儒家思想，作《原道》来排斥佛老，称为“道济天下之溺”。

宋苏洵《上欧阳内翰（修）书》，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里指出韩愈文风格特点，也说明韩文的杰出成就。

宋林光朝《读韩柳苏黄集》论韩愈诗：“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化百出，可喜可愕也。”赞美韩愈的诗，也像韩愈的文章，有大力奔放的，有藏形匿影的，变化无穷。

再看柳宗元的创作，韩愈称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又在《柳子厚墓志铭》称柳宗元的文章：“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卓厉风发。”如《封建论》。又称他贬为永州司马时：“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刻划山水，有杰出成就。柳宗元的寓言小品，如《黔之驴》等，形象生动，含意深刻；他的《段太尉逸事状》，工于塑造人物。在文章的各种体裁上，也作出突出贡献。柳宗元的诗语言峻洁，情意幽深，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评他的诗“发纤浓于简古，寄至

味于淡泊”，有骚人之韵。

韩柳的文论

韩愈在《进学解》中，除推重经书外，称“下逮《庄》《骚》，太史所录。”于诸子中推《庄子》，于史部中推《史记》。他的认识，有超过刘勰处。因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不突出《庄子》，于《史传》中不突出《史记》。韩愈之识见，也超过刘知几，因刘知几在《史通》中尊《汉书》而抑《史记》。

韩愈的文论，有《答李翊书》，提出学道与养气说。

他讲学道为文：“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光明）。仁义之人，其言藹如（状美盛）也。”指学到儒家之道，成为仁义之人，其文自然美好。

讲学道为文的进程：“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状端庄）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然后识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这里讲学道，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求之乎读书之源”，即从诗书的书本上学道，学成为仁义之人，才能写好古文。

再看养气。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是说明古文与骈文不同，骈文要讲声律，调平仄；古文讲气势旺

盛，所以要养气。

韩愈讲古文，先要学道，学习儒家讲的道理。所以他在《答刘正夫书》里说：“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效法古代的圣人贤人，学习他们讲的道理，不学习他们的文辞。因为古代的圣人贤人写的文辞，跟唐代的文辞不完全一样，所以不学习古代的文辞。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答尉迟生书》里说：“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古道有两方面，一方面对唐朝还适用，一方面适应古代的需要，对唐朝已不适用。他在《读仪礼》里说：“考于今，诚无所用之。”所以他在《原道》里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他讲儒家的道理，就讲合乎仁义的道理。道家佛家讲的，不合乎儒家仁义的道理，他要起来反对，这就是他写的《原道》。儒家之外，别的诸子百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对唐朝有用的，他也讲。儒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已经过时的，他不讲。他在《读鹖冠子》里说：“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鹖冠子》是道家，不同于儒家，他却赞美它。他在《读墨子》里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那他讲的古道，也包括墨子之道。但他对于儒家的《仪礼》，却认为已经过时，没有用了。这说明他的学古道，还是比较通达的。但是他的学古道，不论是主要学儒家的道，或学诸子百家的道，都是从书本中学。但柳宗元的学道，就跟他不完全相同了。

再看柳宗元的文论。他在《与友人论为文书》里说：“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为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研之不工，颇赜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

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这是说，文章难以写好，不是因为比兴不足，开拓不广，钻研不深，毛病不去，而是得到道为难。得到道，文章即使有缺点，也像日月的有日蚀月蚀，宝玉上的有斑点，还是日月，还是宝玉，那能伤害它的光明，废黜它是宝玉呢？主要是对道的认识，对道有明显的认识，或不明显，这跟幸或不幸有关，跟辩明或说不明有关，跟文章上升或下降有关，跟观察的正确或不正确有关，跟人家的爱好或厌恶有关，跟交接的广阔或狭隘有关，跟文章屈辱或申展有关。那些自以为得道奋笔写作的，得呢不得呢？还不可知。这是说，对文章的题目作了研究，有了认识，即使文章有毛病，还是日月之蚀，宝玉之瑕，还是好的。对文章的题目，没有研究，没有认识，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不幸的，说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正确的，被人讨厌的，看得不广的，屈辱的。他讲的得道，就是对文章的题目，有研究，有正确认识。这个道不是圣人的仁义之道，是这个题目的道理，这是他与韩愈的不同处。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里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这是说，当时讲道理的有三种：一种是儒家，讲得迂腐迷蒙而不合，一种是切于事实，又讲得苛刻而不合理；一种是好怪而妄言，不可信赖。

再看他的所谓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里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之，道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他认为“道之及，及乎

物”，这是“取道于内”；一种是“贵辞而矜书”，“不亦外乎”。他认为要取道，要“及乎物”，这叫“取道之内”，就是要从事物本身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内”；从书本上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外”。怎么分别取道之内与取道之外呢？可用柳宗元的《天说》来看：

韩愈谓柳子曰：“……吾意有能残斯人（民）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韩愈从书本上去求道，书本上认为天是赏功而罚祸的，因此认为人民垦原田，伐山林，疏沟洫，祸元气阴阳，当受天罚；残害人民的，是减少对元气阴阳的祸害，是有功于天地，当受天赏。柳宗元的求道，“及于物”，即及于天地、元气、阴阳，看到这些物，不会报，也不会怒，不会赏功罚祸。人民垦原田，有收获，有功，功者自功。人民伐山林，有祸，祸者自祸。功和祸，都是人民自造的，欲望天的赏罚者大谬。这是柳宗元求道及于物，是求道之内，胜过韩愈从书本求道之外。

柳宗元的论文求道也与韩愈不同。韩愈论文求道，要学为圣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还是“及于物”。当时认为《五经》与诸子、《离骚》、《史记》等写得最好，就从些书中求写作之道。他在《与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提